

中国

经济特区的前沿专题

苏东斌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经济特区
前沿专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为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特区的创造者而作

中国经济特区的前沿专题

苏东斌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特区的前沿专题/苏东斌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7

ISBN 7-5017-4963-9

I. 中… II. 苏… III. 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国 N.F127.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1528 号

中国经济特区的前沿专题

苏东斌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8.25 印张 368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017-4963-9/F·3937

定价: 32.00 元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特区发展 指导思想的理论分析

一、历史的丰碑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三大理论贡献

(一)

历史上大政治家们，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能够稳定地操纵着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更在于能够成功地驾驭着转折关头所发生的巨变。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关键时期的战略性指针。

在“东欧巨变”、“六·四风波”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展示在世界人民面前：是拨改革开放之乱，返回计划经济之正，还是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求得政局稳定，长治久安？党中央面临着历史性抉择。此时，邓小平以革命家的大无畏胆略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力挽狂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他在庄严地宣布“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两年之后，终于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方谈话”。

英明的战略决策来源于对形势的冷静分析。因为他坚信“人民是看实际的”，所以才能准确地判断出，那场世界性动乱的根源，不在于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与渗透，也不在于欧洲共产党内个别人物的叛变与阴谋，而主要在于经济的停滞与崩溃，在于“腐败丧失了民心”；因为他发现风波

中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所以才能清楚地意识到“就是因为我們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分析。

正是这个讲话既扫荡了当时作为主要危险的“左”倾思潮的干扰（邓小平正面剖析：“把改革和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左’”），又在实际上批判了流行于国内外的“中国改革死了”的悲观论调（邓小平反面告诫：“如果再不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刚刚建立起两年多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扭转了就整体来讲出现的改革停滞、开放萎缩的沉闷局面。“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阶段。

（二）

5 年来的实践充分地表明，“南方谈话”具有三大理论贡献：

第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南方谈话”揭示了“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

1984 年以来，邓小平有三次以提问的方式把他反复思考的既是世界性又是世纪性的难题提了出来，即“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4），“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

全搞清楚”(1985年),“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989年)。邓小平一再声明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果以为此时此刻他在这一原则问题上还会是真的不清醒,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不仅说明了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的怀疑与反思。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先进东西的认同与借鉴的心态。当他看到古今中外都有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命运是与国家概念共存亡的,尤其是看到百分之百的公有经济结构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相反可能成为改革的对象时;当他看到计划并非社会主义特征,日本和法国也都在进行着经济计划工作时;当他看到土地、股票、房屋进入市场构成了按资分配的大量事实,按劳分配也就并非成为社会上唯一的分配形式时,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教条必然发生根本性动摇。于是,他拓宽了视野,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像其他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他从来不愿也没有给社会主义下过什么经典式的定义,但他却从不同的层面上简要的回答了这一问题。归纳起来,他可分为三个层次的涵义。

第一层次,从目的上看,邓小平把它概括为某种理想。他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可以说“公正”加“富裕”是它的基本点。

第二层次,从手段上看,邓小平把它概括为某种政策。他强调,“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的”。

第三层次,从条件上看,邓小平把它概括为某种制度。他强调,“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如果走资本主义

道路，……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毫无疑问，在这里，“目的”所表示的理想是永恒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手段”所体现的政策则是多种多样而且是灵活的，它不再反映本质，仅仅是某种方法；至于“条件”所规定的制度，它必须体现作为目的与手段的保证机制，这种外部条件只能因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而采取不同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因为一旦失去了某种制度上的保证，“目的”就变成纸上谈兵的空想，“手段”也因沙盘作业而无法运行了。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首次向我们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至此，他给了我们一个社会主义的全新概念。

1929年，在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的文章里，当时担任俄共《真理报》主编的布哈林曾用大号字母和黑体字引用了列宁晚期（1923年）的光辉著作《论合作制》中的一句名言：“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来作标题。70年后，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问题。可以说，从列宁的“根本改变”到邓小平的“本质特征”，标志着人类社会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实践，终于在理论上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探索。这一结论不仅显示了从列宁到邓小平对自身以往思想的巨大发展，而且也形成了对新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最高概括。至此，邓小平在实际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一个经典性的解释，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回答。

第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南方谈话”在实际上规定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重要的并不在于有一个神圣的理想、美好的愿望，而在于能够真正架起一道通向彼岸的桥梁。邓小平不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切实找到一条解放而不是桎梏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教训，终于把他的思路引向了改革开放。

如果说“改革”主要是改正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应用的话，那么“开放”主要则是要纠正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如果说“改革”就是指要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开放”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外部延伸罢了。

在这里，一方面，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强调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深刻地总结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因为造成贫穷这一事实，既不是共产党人的愿望，也不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只能归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邓小平这个思想无非是说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只能导致中国人民的普遍贫穷。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一再说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1979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

资本主义”)到1990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从1991年(“不要以为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到1992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都反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个思想又无非说明市场经济已经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有吸收和借鉴它”,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取得优势”。

其实,计划经济的失灵就在于它的实施必须具备两个苛刻的条件:第一,计划部门掌握着全部的市场供求信息;第二,整个社会利益一元化倾斜。这就是说不仅信息要准确、及时、完备,而且经济发展动力要单一,只有中央单一的利益,下级又要绝对服从。因为经济发展常常具有不可预期性,对千千万万、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任何先进的电子计算机都无法反映出来,而指令性指标的存在,又使企业、地方、个人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应该看到,计划经济仅仅适应于战时的紧急状态,与经济的大规模恢复时期。恩格斯曾多次警告我们:不要把历史上的烟草专卖和俾斯麦的国有化说成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性质属于权力经济、命令经济。由于它以配额取代了选择,以统管排斥了竞争,所以它也就成了一种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经济。世界现代史表明,哪个国家不搞市场经济,哪个国家就落后;18年的中国改革史也表明,哪个地区搞了市场经济,哪个地区就迅速发展。

由于“大锅饭”和特权意味着失去了公平,而“票证林立、定量分配”又意味着失去了效率,所以,计划经济所希望解决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也就成了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

猜想。

我们必须看到，那时的社会稳定，正是以人们的普遍贫穷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心灵摧残为代价的。

在“南方谈话”中，即使对于证券、股市这些东西还要不要搞？鉴于改革是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邓小平虽然认为“允许看”，但是，他同时强调“要坚决地试”，因为，这时他已确信这一切都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东西了”。在人类社会，对资源的配置无非有两种方式，或者用行政命令通过指令性指标来计划配置，或者是以市场供求价格的波动引导资源的流向实现市场配置。如果不通过市场交换，由于劳动本身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生产工具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劳动产品有是否适应社会需要的差别，所以，是根本无法确定任何一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可见，价格只能是交换出来的，而决不是计算出来的。

也正是由于单一的市场调节理论，同样具有极为苛刻的条件：第一，价格能准确及时反映稀缺资源的供求状况，从而造成供应总量等于需求总量的均衡经济；第二，没有任何垄断的自由竞争市场。在资源约束、人口约束等经济环境尤其是存在大量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时，价格信号难以自动地调节供求关系。况且有些经济活动本来就不属于单一市场调节的范围。鉴于3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危机，西方世界才出现了主张政府宏观调控的“凯恩斯革命”。也正是基于这种态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才重申，“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政府的计划调节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反动，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因为失去了宏观调控这一块，也就构不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邓小平多次介绍的“日本

就有个企划厅”、“资本主义的最惠国待遇”就是一个明证。

从本世纪 30 年代苏联沃兹涅辛斯基的“商品形式”的论述，到 60 年代苏联利别尔曼的“利润挂帅”的大讨论，从捷克奥塔·锡克的“货币市场理论”到中国孙冶方的“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判断，可以说，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几乎争论了一个多世纪，也大体走了三步曲。即由计划和市场决不相容——计划和市场能够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直到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在中国大地上，才终于逐渐发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强音。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发展目标的确定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理所当然地继承，而在发展道路的选择时，邓小平与毛泽东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三）

为什么邓小平能够得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念？为什么邓小平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命题？从哲学方法上讲，是因为邓小平经过长期痛苦的思索，破除了“教条论”、“凡是论”，终于获得一种崭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目的论”。这可以说是“南方谈话”的又一理论贡献。

在怎样回答上述两大难题的思维方式上，“南方谈话”提出了特有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庄严地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即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三条标准的文字表述从逻辑上看，因为答案包括在疑问之中，所以似乎不易解释，但它的真实涵义人们还是一目了然的。

也许有人认为，若按这三条标准，那么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早就就是社会主义了吗？我理解，邓小平这一貌似一般性提法，却有着极为特殊的纵横方面的双重意义。

从纵的方向看，它是针对着以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若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不出这三条，也就自然地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本色。所以，邓小平不仅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还说“发展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还明确地裁决，“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从横的方向看，它是针对着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若在未来趋势上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与水平，那就一定会发生社会主义的命运危机。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针对着资本主义弊端而引发出来的。他同样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会有问题了。”所以，“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为什么在讲话中总是这样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就是因为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目的本身，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解放和发展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也就是以人自身为目的。马克思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①可见，发达的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2页。

力比现成的有限财富更重要，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创造更多更好的新的财富。

那么，邓小平在讲话中又是如何阐述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目标的呢？本来，“共同富裕”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判断。应该说，这一点一直是建国后的苦苦追求。但由于实行着大一统的平均主义，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在本来一个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舞台上却演出了一场普遍贫穷的悲剧。也正是面对着以往这一条根本走不通的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设计师，才能在深刻的批判现代空想思潮的同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创办中国经济特区这个具有转折性战略决策。

在这里，邓小平在方法论上完全抛弃了对概念的绝对化理解，没有在绝对平均主义内容上去说明这一个目标，而只把它表述为社会财富总水平的提高和个人收入超过时代贫困线。它的对立面是在普遍贫穷基础上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

显然邓小平的功绩并不在于确认一个“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在于终于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这里，第一，作为过程，邓小平主张“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第二，作为结果，邓小平主张“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三，作为方法，邓小平主张“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第四，作为时间，邓小平主张“太早这样办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起码本世纪末以前不向你

们开刀”；第五，作为方向，邓小平主张“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请同志们看看，这是一条多么清晰的思想轨迹啊！

邓小平的这个反教条主义，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

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规律决定着“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过程，而个人劳动差异和与此相适应的收入差异又决定着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政策调节的理论基石就是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规律”，高收入政策的客观依据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属性。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显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目的论。这个判断标准确凿地指示我们，应该从功能方向上而不仅仅从结构组织上，从价值取向上而不仅仅从具体制度上，从根本目的上而不仅仅从各种手段上，去综合考察社会主义的现实。目的论，即目的高于手段论，即当以往的手段与原则难以达到根本目的时，就毫不犹豫地修正以往的手段与原则而不是篡改目的本身的论点，邓小平的“目的论”曾长期被视为实用主义或狭隘经验论。其实，二十多年前邓小平的“猫论”不过就是“目的论”的一个形象比喻罢了。因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只有一个，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有千条万条。所以，我们既不应该在这三条标准之外再加入第四条、第五条，也不应该把这三条标准的作用范围贬低为一般工作标准，甚至仅仅是经济工作标准，从而把这一重大的、根本性标准驱赶到一个十分狭小的领域。

邓小平并不是一位单纯的理论家，他的观点散见在一系列讲话、语录、批示的条文中，它以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达